

引用:李亚飞,杨丽.三才之道视域下早期本草君臣佐使药的分类与配伍原则[J].中医药导报,2025,31(2):204-209.

三才之道视域下早期本草君臣佐使药的分类与配伍原则*

李亚飞¹,杨丽²

(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2.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105)

[摘要] 易学的三才之道,主导建构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早期本草学君臣佐使药的分类与配伍法则。本草学继承先秦以来易学三才之道的德用、价值观及其体现的社会政治秩序,法象乾坤的卦象与义理,推动本草分类与配伍原则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本草学的君臣佐使,存在尤重“养生”的分类与配伍和更重“治病”的配伍两种模式,前者更能体现三才之道的本体视域。本草学君臣佐使的理念影响了《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之后的医家,积极推动本草学分类与配伍理论的建构与完善。尽管本草学配伍原则与方法发生嬗变,但不变的是医易三才之道追求“合和”与“生生”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 三才之道;本草分类;本草配伍;乾卦;坤卦;《神农本草经》

[中图分类号] R2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2-0204-06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103.001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Principles of Early Herbal Medicines with the Rank of Jun, Chen, and Zuosh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Talents Theory

LI Yafei¹, YANG Li²

(1.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for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The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5,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Talents Theory of Yi Xue domin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rules of the early herbal medicine with the rank of Jun, Chen, and Zuoshi represented by the *Shennong Bencao Jing*. The theory of herbal medicine inherits the moral use, values and social political order represented by the Three Talents Theory of the Pre-Qin period, as well as the hexagram imag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Fangxiang Qiankun, driving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principles of herbal medicine. There are two mod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in herbal medicine with the rank of Jun, Chen, and Zuoshi, namely the one that places great emphasis on "preserving life" and the one that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reating diseases". The former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Talents Theory. The concept of the herbal medicine's Jun, Chen, and Zuoshi has influenced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since the *Shennong Bencao Jing* and the *Tangyin Jing*,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of herbal medicine. Although the rules and methods of herbal medicine compatibility have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the unchanging value concept pursued by the medical and the Three Talents Theory of Yi Xue is the pursuit of "harmony" and "vitality".

[Keywords] Three Talents Theory; herbal classification; herbal compatibility; divinatory symbols of the Qian; divinatory symbols of the Kun; *Shennong Bencao Jing*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CZX033)

通信作者:杨丽,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文化

《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草经》”)最早援引易学三才之道,鉴别本草药用价值的优劣,归类本草为上中下三品,对本草纲目分类与配伍的影响深远。《本草经》援引三才之道建构三品药的自然观、生命观、效用观与价值观的同时,也以该道与社会政治秩序结合,建构君臣佐使药的分类与配伍。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儒家尊君思想的角度概要提及《本草经》药物分类与配伍所受的影响^[1],尚未深入研讨易学三才之道所起的关键作用。笔者基于易学与医学古典文献,用现代逻辑化的语言诠释相关意蕴,力图使文献间的思想形成相互对话与参证,从而深化对本草学君臣佐使药的分类缘由、配伍原则,以及后世影响与演变等方面的诠释。

1 先秦时期的三才观

先秦时期已形成意蕴丰富的三才观。该时期,天地逐渐淡去神秘的色彩,向生存的自然场域、生命的来源转变。《管子·内业》载:“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2]《左传·成公十三年》也载:“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3]天地不仅是生命的来源,还是人事礼法的价值本源,天地人三才已从繁物错杂的生存世界中凸显而出,成为命运共同体中最具意义的三大实在。《道德经》言“四大”其实是“三大”,突出三才极其重要的地位。“故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三大”即天大、地大、王(人)大,人取法天地运动变化之象,就能够进一步领会自在、自足、无为的“自然”之“道”,老子的“道”并非独立、并列于“三大”为一有形实体,而是内在于天地人,是天地人存在的根源与意义、价值的本体。

随着人类越来越理性,人也从崇拜并依附于天地,转向积极效法天地的运作动象,依靠人自身的能动性成就生命存在的价值。《吕氏春秋·孟春纪》言:“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5]天地皆在“道”的作用下,涌现为客观的运动法理,人不能按照自身的意志肆意改变这种“天理”,更不能扰乱依“天理”而制定的社会礼法。《论语·尧曰》言:“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6]人作为智慧的觉悟者,能够把握天地的“历数”,使天地的理则在人身的参与、践行中开显出来。《中庸》则通过内诚人的心性,做到行为方式与外物相适宜,从而尽人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7]。通过涵养内在心性,规范外在行为,人就可以参与到天地大化流行的过程中,达到人与天地并立的崇高价值。

先秦时期,是《周易》通过卦爻的三分式排列结构,最早系统地提出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8]^[38]一卦中六爻各两分,上两爻、中两爻与下两爻分别象征天人地,以阴阳爻的不同排列组合构成的六十四卦,隐喻三才之道的运动变化原理。《周易·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刚。”^[8]^[48]这就通过卦爻画的系统建构,把三才之道的结构、内

涵与意义加以规定,赋予其阴阳刚柔的自然之理与仁义等人的伦道德价值,为本草学效法易学三才的自然与性命之理,归类三品药与君臣佐使药的理法与价值秩序,提供了理论来源。

2 三才之道影响下本草君臣佐使的分类缘由

《本草经·序录》同样效法天地人三才,从而体验并运用本草之“道”。“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9]《本草经》“法天”,以上(品)药养命应天为君,中药“法人”,养性应人为臣,下药“法地”,治病应地为佐使,并参照“人道”的家庭结构,认为“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华实,草石骨肉”^[10]。以“子母”拟象药物间的“衍生关系”,以“兄弟”隐喻形貌相似植物的“亲缘关系”^[11],使“天人同构”的自然品序、“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规范与“身国同构”的身体、社会秩序,在本草的配伍上贯通一体,不仅体现了“性命双修”心灵涵养与生命康养内在统一的观念,也是“身国同治”,治国如治身,治国与治身之理别无二致价值取向的体现。

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与上药“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主治病以应地”一样,都法象乾卦与坤卦的深层隐喻。乾坤君臣的物象隐喻,卦爻时位转变引发的义理阐释与内涵的转向,以及此二卦与爻辞可进一步阐释和发挥的空间,都为本草君臣佐使的分类与贵君药而慎臣药、佐使药的价值取向,创造了无限的灵感与理性依据。

《易传》言乾(☰)“为天”“为君”“为父”“为首”^[12]^[60],表明乾卦是极致统率力与尊位的象征,自然也是德才兼备者的典型意象。君是天之子,其生命、智慧与品德皆禀赋于流行的“天命”,德用如太和刚健、资始万物的乾卦,其至尊的九五爻更是在时位上象征君主,是乾卦隐喻的人格典范——君主。九五爻居上卦之中位,为全卦之主,毗邻的上下二爻皆为志同道合的阳爻,又与下卦之主,居中的九二爻为应爻。九五爻既居中位,又下有应爻的支持与全爻皆阳的同志拥戴,可谓既得上下齐心之时,又得“九五至尊”之位,所以极具凝聚力、向心力与号召力,贵居君主之位。

本草的上药与天交相感应,正与乾卦的卦德及九五爻“居中得正”的时位勾连。乾天与君药,依据其“仁育”价值得以实现的“才”与“生生”之德,在共同资始生命的生存时间中“法万物生荣时也”^[13],使生命能够依据自身的禀性,在圆满实现自我潜能的生命历程中生生不息。“病既愈矣,命亦兼审”^[14]的上品药,破除了生命自我修复、自我组织、自我协调与自我实现中“病”的阻碍因素,延展了生命的长度。“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不为仓卒之效,然而岁月将服,必获大益”^[15],也是乾天给予生命活力的创生性活动中,其力量醇和性、稳定性与持久性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奇效获得中,上品药并非作为外在的干预因素,使生命悖反或超越“天命”禀赋之性的规定与限制,获得“天命”之外的生命功能与无尽的命数,而是作为具有扶助与推

动作用的他者,帮助生命潜能充分释放“天命之性”,使身体轻盈气足,成就“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12][25]}。身体轻盈与气力的获得,与乾天主气,集聚清轻的“清阳”之气的物象契合;不老与延年,更是“乾,健也”^{[8][65]},乾阳健运,生生不息的直观体现。这些生命的积极成就,恰与未及天年而中道夭,未能顺应天时运作的规定而造成生命夭折的悲剧形成巨大反差。

《易传》言“坤为地,为母”^{[8][66]},主要突出坤(☷)卦象征奉天时命而资养、成就万物的积极价值取向,汉代易学则突出《易传》中“坤为地”,柔顺顺承于天而承养万物的意象,引申出“坤为臣”等物象象征。如《孟氏逸象》言“坤为臣,顺臣,民,万民”^[13],如虞翻所言“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阅藏物,故‘以简能’矣”^[14]。坤臣具体以其“简能”之才,受纳万物,藏而养之,为万物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源源不断的保障,配合乾君光明“昭物”,促使万物显现其生命价值而不至隐没。

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正是法象社会政治中臣的职能,能够使民众禀自乾天(天命)的生命自性潜能得到充分的滋养与守护。无论中药有毒、无毒,只要“斟酌其宜”,针对不同疾病,恰到好处地顺应天时,秉持“中道”的原则,择取药之偏性以调和身体阴阳的失衡,就能够扬长避短,“遏病补虚羸”。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言:“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也。”^[15]犹如“国老”作为一国之臣惩恶扬善,治国之疾,弘扬社会正气,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一样,中品药也能祛除邪气,消除否定身体的致病因素而治身体之疾,培养身体正气,补虚为羸,使生命禀赋而来的潜能获得顺畅地实现。

而下药的佐使“多毒,不可久服”,则更多的是在坤卦“地体收煞”^{[16][8]}的消极意义上讲,以地体与秋冬枯藏万物的危机时间,打造惧怕的情感境域,借以警示利用本草的生存活动要谨守中和之道。广义上,佐使有传达、执行上级命令的职能,仍属于臣,处臣中下级之位,若与地处下、主杀、凶为同类之象,则多为酷吏、暴吏、刑官。其虽能治病,但也多毒,首先表现为药的偏热、偏寒之性过强,药性过于燥烈或阴寒,故《汉书·艺文志》言医用经方治病,“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16]。药的偏性可纠正身体偏离中和的状态,“热因寒用,寒因热用”^{[17][89]},当分别用与寒病、热病病证相反的偏热、偏寒的药性,使太过的病性及与其相反的药性双方消除对待而“致中和”,反之,则只能加重身体失和的偏性。“气增而久,夭之由也。”^{[17][90]}久用偏用药物寒热之气,则使身体的偏性走向极端,使阴阳之气失衡而导致一方的偏胜,最终量变引起质变,消灭了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的条件,使生命内部互根互用,阴阳相互维系、互动的生存状态走向偏绝;其次是其毒副作用明显,用毒药治病属于以毒攻毒“主攻攻击”的攻法。陶弘景言下药“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恒服,疾愈则止”,“法万物枯藏时也”^{[11][8]},其药性的峻猛与药气的肃杀,留给医者调和居中的空间与张力极为有限。《周礼·天官冢宰》讲“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以“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18]。可见早期医者治病,就已用药性之偏的“毒药”来行医事,医师(官)以医者驾驭“毒药”能力

的大小判断其医术的高低,标准尺度当是医者失守“中和”概率的大小。毒药偏激的药性较难把控,对医者守持中道的水平要求极高,不如用平和无毒的上药养生,未病先防的预见性高明,故上医治未病,下医才治病。不得已而用下药,只能逞一时之用,中病即止,否则容易削弱正气,泯灭生气。

3 三才之道影响下早期本草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

依据医易之义,《本草经》除了分论三品药的药性、效用与价值的高低之外,还简要提出三品药之间的配伍方法,同样体现乾坤的义理。“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19]君臣佐使之药相互配合,使宣导与收摄气机,功效相反相成的药物之间保持恰当的张力。宣中有收,不至于宣散太过,散失精气。阳气具有固摄精气的作用,宣散太过则精气因阳气失守而消散。“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17]使阳气固密,则精不外泄;相反,收中有宣,则不至于收敛太过而郁结气机。药气的宣降效用正是乾坤天地之气升降交感流行之理的具体体现。乾天主升气散气,坤地主收气纳气,只有二者充分的交通互感,升中有降,降中有收,才能气化流行;若二者各自散收太过,则天地离绝,形成天地之气无法沟通的“否卦”(䷋)象。药气的升降浮沉,正是由乾坤卦气与天地气机运动流行的秩序所主导与推动。

药物君臣佐使间的配伍存在“合和”的理想比例关系,体现出《易传》“明王道”的政治伦理色彩。无论是“一君、二臣、三佐、五使”,还是“一君、三臣、九佐使”,都始终维持养命君药的唯一性与绝对尊位,突出生命最为尊贵,养命以应天的核心价值。而臣与佐使药数递增的次序,能够分层逐级发挥君药养命的效能,兼顾养性与治病的次要价值取向,是《易传》“天尊地卑”价值取向的再现。《易传》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8][66]}阳卦为一阳爻二阴爻,阴爻居多,阴卦二阳爻一阴爻,阳爻为众,唯一的阳爻或阴爻往往决定一卦的阴阳归属。此则以一阳爻所象征的君主,和二阴爻代表的臣民组成的阳卦,作为君子之道的重要体现;以二阴爻表象君主,一阳爻隐喻臣民而构成的阴卦,则隐喻小人之道。通过阴阳卦爻的排列组合,直观显现君主的乾阳至健之体与独尊的时位,以及小人阴险聚众与谋算的居心。本草的配伍与卦爻的组合一样,也是“天尊地卑”价值观的体现。“一君、二臣”正是《周易》乾为天,为君主,具有绝对权威的君道、王道再现,无论是“三佐五使”,还是“三臣九佐使”,都尽量避开了阴数,也是易学“崇阳抑阴”观念的本草学表达。

“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19],人要“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19],以卦爻、易理而明王道政治,通过效法乾坤之象,申明“天尊地卑”“崇阳抑阴”的思想倾向,规正君臣之间的政治秩序,作为先秦两汉普适性的价值观,也具体落实到了本草的配伍及其价值取向之中,使本草在人身生命所发生的和谐感应,具有崇尚君道光明正大,弘扬正气,以维护生命与社会共同体和谐有序的价值取向。

4 本草学君臣佐使配伍的影响与演变

本草学三品说内在包涵君臣佐使的归类和配伍的方法，后者是前者本义的引申与发挥，虽然二者建构了药物分类的总纲与药物配伍的一般原则，对后世本草学药物分类与性理建构影响深远，但在后世发展中，二者影响时间的长短与内涵的变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历史传承中，三品说的内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被使用的时间短于后者，唐代的陈藏器在开元年间撰《本草拾遗》时，已启用基于本草效用的“十剂分类法”取代三品分类法；不同的是，后者建构的原初内涵在陶弘景所处的南北朝时期就已发生变化，但其形式、名称则一直沿用至今。

《本草经》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与价值观，以易学三才之道，尤其是其“人（王）之道”为典范建构，但药物配伍原则灵活多变，君臣佐使的内涵与用法也具有多样性，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更加充实并发生创造性转变。

4.1 陶弘景遵从三品说与主病的两种配伍制 陶弘景所处的南北朝，属于本草配伍原则逐渐脱离易学三才之道的规约而转变过渡的阶段。“案今用药犹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则势力不周故也。而检世道诸方，亦不必皆尔。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犹依本性所主，而兼复斟酌。详用此者，益当为善。又恐上品君中，复各有贵贱。譬如列国诸侯，虽并得称君制，而犹归宗周。臣佐之中，亦当如此。所以门冬、远志，别有君臣。甘草国老、大黄将军，明其优劣，不皆同秩。自非农岐之徒，孰敢诠正，正应领略轻重，为分剂也。”^{[11][9]-[10]}他从药用实践理性的角度，仍然积极评价古制君臣配伍的实效。君药多为性缓无毒，适合长期服食养生延命之用；臣药主要为辅助君药养生或养性之用；有治病之用的多为“气力”充足甚至峻猛的佐使药或部分臣药。服食养生当然可以效法乾道的仁育之德，倚重君药，但在医疗实践中，本草配伍宜以治病为先，理当法象坤卦的收煞肃杀而祛邪，故臣药与佐使药的药味比例更重，不使君药居多，才能高效发挥药物“气力”以纠身体阴阳之偏。

但齐梁之时诸方并没有刻板遵循君臣古制。陶弘景宗周朝礼乐政治制度，给予此种现象以“人道”支撑。其时之方多君药，看似违背君主唯一的古制，实则犹宗周朝的分封制，各诸侯王皆称为君而多君，但仍共奉周天子为独尊，臣佐当中也复有上下等级之序。故君药之中亦有贵贱之分，都因循药性之效与主治之病而随时调整处方，正如《庄子·徐无鬼》所言：“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癰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12][54]}遣方用药乃是结合节气或气候的变化，及相关联的疾病症状不同，而选择主治（君）之药，并没有独贵某一种特定的药，以此保持病、药、时统一的中和本位，让药效能够跟随参与到时间或时势的变化之中，而分别治疗适宜的病证。陶弘景据周礼政治的正统性为南北朝时期的方药不顽守古制立据，认为适度的变化，仍是古制的应有之义，体现了一种既尊重历史与文化，又在即有文明基础上积极创造的历史观与药用观。

陶弘景基于用药治病为主导的配伍观念，又总结当时异

于《本草经》三品说尤重养生的配伍观，而以治病为目的的配伍原则。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论述《汤液经法》治病贵在根据脏腑虚实进行药味补泻的理法，并辑录：“[经云]：主于补泻者为君，数量同于君[而]非主故为臣，[从于佐监]者为佐使。”^[20]可见，该君臣佐使的配伍观念是以五脏虚实补泻为中心，以主病具有主导补泻效力的药为君，以协同配合君药，药味数相等的药为臣，君药也不再具有唯一性，并看重君臣之间药味数量的一致性，而具有“佐监”效力的药味则为佐使。该书中的“经云”的内容皆引自《黄帝内经》，但考此文献不见王冰定本的《黄帝内经》，并且该书与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方药配伍颇多类同，皆取法《汤液经法》，故该“经云”当为早于王冰的《黄帝内经》更早版本，反映的是先秦两汉以来另一种主流的君臣佐使配伍观。

4.2 唐朝王冰时君臣佐使制已皆为主病的方剂配伍原则 王冰定本的《黄帝内经素问》，在南北朝以来药物配伍观念逐渐转变的基础上，完成药物配伍观念的转型，三才之道不再作为药物分类的依据，但作为形而上之“道”这一本体，仍运用于本草的配伍之中。君臣佐使不再用于框定药物的品类，局限于药物三品的分类之中，而是作为方剂治病配伍的用药原则，按照主治、辅治、佐治等功效的不同而随时做出区分，尤其是君臣之药，按照主病、佐治的不同作用，可随时调整，且君臣之药的数量也不再相等。《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言：“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帝曰：三品何谓？岐伯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17][90]}君臣佐使的配伍已不在《本草经》三品说的范畴内加以讨论，已剥离本草配伍依据三才之道创建的范式，不以“主（治）病”之药为佐使，为“配角”，恰恰相反，而以“主病”药为“对证之要药”^{[21][304]}的君药，佐君治病药为臣药，应臣为使药。使药如使者，“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21][304]}。接续、发展的当是《汤液经法》以来的君臣佐使观，淡化了三才之道对于本草的分类作用，以及养生为上、养性为中、治病为下的药物贵贱等级之分与善恶价值之别，而更加倾向于药物或攻，或补，或攻补兼用，补泻相间，或有毒，或无毒，或有毒、无毒相间而治病的理性实践，也剔除了早期本草学崇尚服食养生的仙道色彩。

4.3 唐时君臣佐使药味的比例成为大方、小方及奇方、偶方划分的依据 基于以治病为主导，而非以三品、三才“善恶之殊贯”为价值导向的思想转向，《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明确了大方、小方之制与奇方、偶方之别，以及各自的适应证。“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帝曰：请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17][88]}治病之道，不仅有以毒攻毒之法，也有无毒调和之规，择取何法治之，全取决于疾病的性质，并量病之轻重，为大小方药之制。《本草经》的“一君二臣三佐五使”被规定为中方之制，“一君三臣九佐使”才为大方之制，“君一臣二”则为小方之制。

除大小方制外，《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还有与河洛之数

的奇偶之制，并有功效点位的“远”“近”不同。“《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三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17][18]}奇偶之制作为河洛象数的具体运用，仍是三才乾坤天地之道的具体表达。药象的君臣与味数的数术之理，在河洛象数的视域下得以透彻说明。河洛之数中，天数皆为水一、木三、土五、火七、金九的阳数、生数，地数皆为火二、金四、水六、木八的阴数、成数，这也是乾天主生、坤地主成观念的数术运用。清代张志聪以“君一臣二”为“圆之象也”，以君一与臣二之和的三数为天数的生数，故“夫数之始于一而成于三”，成“天圆”之象；“君三臣三”相合则为五的土数；“君二臣六”，既是“以二偶而成六”为阴数、地数所呈的“方之象也”，也是和数八象征的“乾坤位而八卦成也”^{[22][454]}。

在此基础上，张志聪提出洛书之数仍是三才之道在“自然之数”的重要体现。“多则九之，阳数之终也。夫阴阳之道，始于一而终于九者，此《洛书》之数也。禹疏九畴而洪水平，箕子陈洪范而彝伦攸叙。盖《洛书》所陈九畴皆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本经八十一篇统论天地人三才之道，皆有自然之数，故曰大要。”^{[22][454]}洛书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一为数之始，九为数之极，洛书的洪范九畴就是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包含自然、政事、农事、道德等天地人的三才之道，所以《黄帝内经》药物配伍的奇偶之制，也在九畴的范围之内。这是从象数的角度统论三才之道的重要内容，而不同于《本草经》从价值观的角度“明善恶之殊贵”的三品说。

但近用奇方，远用偶方，仍属《本草经》意义上的三才之道。方之奇偶指一方之中药味总数的奇偶。“近者，谓病之在上而近，故宜用奇方以治之，天气之在上也。远者，谓病之在下而远，故宜用偶数以治之，地气之在下也。”^{[16][454]}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三才分类观念的经典模式。天为阳在上，与奇为阳数，近为阳为同一范畴，故病在上而近，宜用奇方以治之，这是由数推及象、位与方，使奇、天、上、近、方归为同类；同理，地为阴居下，与偶数为阴，距离之远，病在下，方偶纳为一类，故用偶方以治。发汗用偶方，泄下用奇方，仍是三才的气化论，“汗乃阴液，故宜用偶而不以奇，盖直从下而使上，犹地气升而后能为云为雨也。下宜用奇而不以偶，盖从上而使之下，从天气之下降也”^{[22][454]}。发汗用偶方，拟象同类的地气自下而上升为云雨的自然现象；泄下用奇方，则法象天气自上而降下的运动。奇偶之方所串联起来的归类与运动趋势，同样也是《周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8][452]}的种属分类方法在本草学上的运用，以及“同气相求”易学气化论在药气升降上的体现。

4.4 宋以来异于《黄帝内经》强调配伍的药味比例而更关注药量比例 宋以来，君药多为用量最重、力最大者，以君药用量为中心厘定君臣佐使药量的秩序。如张元素言“力大者为君”，“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23]。君药用量最多，药力自然也最大，为主病之药，“‘力大者为君’，是‘主病之谓君’的补充”^[24]，臣与佐使药的用量则分别递减，体现君药最强的效力。元代李东垣、明代张介宾等医家亦持此论，反映了宋朝以来本草配伍的普遍思潮。

5 讨 论

总之，易学三才之道影响下本草学君臣佐使的分类与配伍，充分彰显了天道贯注于人道、物理，人道、物理又具体实现天道的价值原则。其中，“天”的创生作用所体现的“易”的“生意”，是本草配伍与分类的根本精神，体现于医家如何恰到好处地用药，实现“时中”的和谐理想，用药充分呵护生命的自愈力而愈疾、延命与养生。天地人三才的德用与价值取向的差异是早期本草学君臣佐使药分类的前提，而“天道”升降浮沉的气化秩序与宣降的功用，以及落实于“人制”的官僚品级高下秩序与宣摄作用，则是早期本草学配伍的依据。陶弘景言用药之制“犹如立人之制”^{[11][9]}，指明本草学是以人道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为创立药用法规的直接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25]，人制的依据是天道，所以法象人制的药制的终极本原仍是天道，或者说是密不可分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

尽管三才之道影响下君臣佐使的分类与配伍观念发生了历史的嬗变，但其作为药术之“道”与药用之“体”的根本地位不容动摇^[26]。在此意义上，三才之道实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依旧是本草学“古典”与“现代”学术与药用交融对话，获取药用方法论与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对于当代中药科研与临床药用仍具有关键的作用与价值。后世所出的三才丸及三才封髓丹，即是依据三才之道所创的成药配伍。当代中药科研，也不能局限于分子生物学的学科领域，割裂文化的母体与血脉，而当找到中医学理的支撑与价值的本原，重建天地人生态和谐互动的整体，追溯药物配伍的深度义理与“生生”“和谐”的价值取向。此外，三才之道视域下的君臣佐使药的分类与配伍，对于临床如何合理用药养生保健，恰当而谨慎地使用“毒药”治病，以及重视“治未病”的理念也极具启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品药有丹砂（朱砂）、细辛等个别被冠以“有毒”矿物或植物，据此，常有人质疑上品药“无毒”的正确性，进而否定三品说的合理性。《本草经》及《本草纲目》等代表性本草著作皆言朱砂、细辛无毒，后者引《余冬录》言：“丹砂性寒而无毒，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物性逐火而变。”^{[27][233]}朱砂在高温下才会释放汞毒。朱砂的主要成分硫化汞可溶性差，难以被人吸收^[28]，正常剂量煎药或生服，毒性极小。细辛煎剂常用量少有毒性，《本草纲目》有“若单用末，不可过一钱。多则气闷塞不通者死，虽死无伤。近年开平狱中常治此，不可不记。非本有毒，但有识多寡耳”^{[27][376]}的说法，细辛为散剂或生服，且超过一定的用量，服不得法才会致死。本草学具有严格的制作、服用方法，又多配伍解毒药，《本草经》上品药的分类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草经集注》的《序录》并非晚出，敦煌残卷（编号：龙530）收有该《序录》，为唐开元写本，据考证临书的原本为六朝写本，该写本关于三品药的文献与本文所引文献一致^[29]。

参考文献

- [1] 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2-43.

- [2] 管子[M].房玄龄,注.刘晓艺,校点.刘绩,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33.
- [3] 左丘明.左传[M].杜预,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40.
- [4] 老子.道德经[M].陈忠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45.
- [5] 吕氏春秋[M].高诱,注.毕沅,校.徐小蛮,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
- [6] 论语[M].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188.
- [7] 大学 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06.
- [8] 周易[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
- [9] 张瑞贤,张卫,刘更生.神农本草经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 [10] 尚志钧校注.神农本草经校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42.
- [11]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M].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12] 庄子注疏[M].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3] 尚秉和.焦氏易诂[M].陈金生,点校.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369.
- [14] 李鼎祚.周易集解[M].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392.
- [15] 衣之镖,赵怀舟,衣玉品.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校注讲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89.
- [16]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1396.
- [17] 黄帝内经·素问[M].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18]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8.
- [19] 易纬[M].郑玄,注.常羲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20:3.
- [20] 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27.
- [21] 张介宾.类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20.
- [22] 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
- [23] 张元素.医学启源[M].郑洪新,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91.
- [24] 李飞.方剂君臣佐使中的君药辨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37(4):481-484.
- [25]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刻本.北京:[出版者不详],1795(清乾隆六十年).
- [26] 李亚飞.易学三才之道对本草学三品说发生与建构的影响[J/OL].中医学报,1-13[2024-09-23].<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1.1411.r.20240914.0835.006.html>.
- [27] 李时珍.本草纲目[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28] 孙赛阳,李海波.含砷汞中成药安宫牛黄丸安全性应用研究[J/OL].实用中医内科杂志,1-7[2024-05-26].<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1.1187.R.20240425.1052.002.html>.
- [29] 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380.

(收稿日期:2024-06-26 编辑:刘国华)

- (上接第20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4.
- [9] 葛洪.抱朴子[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7.
- [10] 掌禹锡.嘉祐本草辑复本[M].尚志钧,辑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 [11] 班固.汉书:第一册[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88.
- [12] 李珣.海药本草: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5.
- [13] 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8,167.
- [14] 廖品正.中医眼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5.
- [15] 丹波康赖.医心方[M].多纪元坚,校订.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26-127.
- [16]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17]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 [18] 吕洞宾.吕洞宾全集[M].刘体恕,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538.

- [19] 严用和.重辑严氏济生方[M].王道瑞,申好真,重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74.
- [20] 刘约瑟,张娟,赵培娜,等.基于“心主神志”理论探讨癌因性失眠治疗思路[J].中医药导报,2023,29(10):200-204.
- [21] 孟永亮.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89-90.
- [22] 范家伟.北宋馆阁官、儒臣与校正医书局[J].汉学研究,2011,29(3):89-124.
- [23] 刘苏槿,李文飞,曾凤.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药名探析[J].中医药文化,2024,19(4):365-372.
- [24] 张少乾,李楠,潘锋,等.《千金要方》新雕本、宋校本“桂”类药物异文探析[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39(10):2424-2428.
- [25] 王宁,张少乾,曾凤.《千金要方》宋校本、新雕本栝楼类药物异文考[J].环球中医药,2022,15(9):1565-1568.
- [26] 李家萱,李文飞,孟庆鸿,等.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3(3):575-578.

(收稿日期:2024-07-23 编辑:刘国华)